

猴年歲末，我來到清華園，準備參與一個追思季羨林先生的講座。

住在甲所，細雨中，門前的梅花還沒有開。這個地方原來是梅貽琦校長的公署，與我有深緣。跨過年去，就是西南聯大建校 80 周年。從前幾次西南聯大「校慶」時，我都來甲所探訪，結識了多位令人敬重的老學長。如今他們都遠隔天涯，或去了另一個世界。清華園內，我訪問過的施加煥、董樹屏先生俱已仙逝，而音容宛在。

特約撰稿 張曼菱 2017 年清明於昆明



清華園內探師長

微雨不停，與小友文靖相約，同去探望何兆武先生。我曾經兩度探訪過何先生，一次在他家，一次在荷塘。

他有一段特別的經歷，曾在 1945 年台灣「光復」時，登島教學。他任教的台北建國中學，我到島拍攝了。校園內有一座孫中山的立像，是島上著名的中學。當年台灣遍地日文，他們這一批人上島後，推廣「國語」很艱難。

進屋時，何老正倚在床上看一本舊的《炎黃春秋》，看見我們來了，他立刻翻身起來，自己穿上了皮鞋，坐在床邊，與我們聊天。可謂是精神矍鑠。雨天霧霾，對他好像無多影響。也許是與他剛才看的刊物有關，他對我們聊起了「文革」抄家的事。他說：

「童子軍」抄家，把侯外廬先生的「名牌打火機」揣走了。抄他的家時，領隊的向他借錢兩次，說是「父親病了」。一借不還。另外一次抄家時，領隊的帶著老婆來，把他的英文小說拿走了。領隊的老婆是學英文的，是「有備而來」。這些人在「文革」後都離開了歷史所，因為知道事情「站不住」。何老問道：現在「反貪」，那麼抄家時的貪污該不該算在內啊？在老爺子的「記憶」中，有時空交叉的語言。聽那一代學者聊天，有大智慧，他們自己常常不會來點明那個「話題」。告辭時，老爺子堅持起身，送我們到樓道口，才揮手而別。

這樣的彬彬君子，卻因爲晚年大著《上學記》而「得罪」某些人。其實他只是紀錄了發生過的事情。那些日子裏何老很是鬱悶，曾經和我相約「喝酒」。

這天下午，老同學馬波來訪。自從學生時代，在北大南校門他交給我那部《八年》的手稿，中間又過去了多少煙雲。《八年》後來改名叫《血色黃昏》了。可我認爲還是原名好，符合記憶風格，蒼勁沉鬱。他寫的是紀實，個人傳記是歷史。把這樣的東西「文學化」，反而會失去它內在的多義性。馬波出身於文化與革命的家庭，自己又投身社會風暴中。從他那著名的母親寫到他自己，一頁頁可圈可點。我曾戲稱他是「化石」。他具有一種保存歷史原味的「化石」般的本領，他一直頑固地拒絕融入世俗社會，或許與這種天性和使命感有關。他告訴我，他長期獨居鄉下，養了兩條狗，到時間必須喂。他是開車來的，我在夜雨裏看他開車走了。有深度的作品，無不是在孤獨的寒夜裏完成的。

元旦後，我移住勺園，想去看望老師，雨和霾使年邁人在嚴寒中紛紛病倒。孫玉石老師大部分時間只能躺著。八旬之人，他每天晚上還是要打開電腦，查閱資料，做阿壠的詩歌研究。他夫人對我說，阿壠的資料極其難找，找到一些舊報紙，字跡也難以辨認。孫老師說：「過去文學史上對阿壠的忽略是不公正的。」坐的是「冷板凳」，著的是熱血文章。重新拾回這份「記憶」，本身就蘊含著重要的「話題」。阿壠，是一位被「胡風案」牽連而埋沒了的詩人。

另一位我準備去探望的袁行霈老師，「流感」住院了。曾經在中文系「百年系慶」大會上，袁老師登台一呼，提出：「一切爲了人的尊嚴」。凡是熟知他的人生遭遇與執教的學生，都會明白這對於中文系和袁先生而言，都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概括。在袁行霈老師八旬華誕的紀念文集中收了我的回憶他執教的文字，就用了這個標題「爲了人的尊嚴」。

再爲季羨林辯

在京都難得的晴天裏，我的新書《爲季羨林辯：幾多風光幾多愁》在三元橋「舊國展中心」召開了發布會。書名如此扎眼，是由形勢所逼。一個默默的校園學者突然變成了「泰斗」，來到社會上領受萬衆景仰，死後又遭到非議甚至謾罵。我寫季羨林的文章，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的。一開始，就被逼出了若干「話題」。

邵燕祥先生爲這本書題詞。邵先生從上海回來後一直病著，發來信讓我保重。他的新作《我死過我幸存 我作證》剛獲了獎。邵先生在探訪中說，書名的前兩句是出版社擬的，「我作證」是他自己加上的。那麼，「我死過，我幸存」就是「記憶」了。而「我作證」可以理解爲「話題」。邵先生說，只是存在過，還活著，有什麼意思呢？

錢理群師兄爲我的這本書作了序。我去看望時，他贈我一本《一路走來——錢理群自述》。他的一貫風格就是典型的「記憶」與「話題」，回顧中帶著審視，混爲一談，相互印證。在那間書房兼臥室裏，桌上燈白天還是開著。理群兄說，他正在研究中國改革之初「打開瓶頸」的那個年代的事。師兄對他的生活很滿意，我卻對這個隔絕於社會的環境有些遺憾甚至擔憂。

切入現實的文字別有一種力量。2013 年春天我在《明報月刊》上登上文章《季羨林：懷念與思考》後，很多人聲稱，在網上看到這篇文章，完全改變了他們對季先生的看法。很多人的「看法」都是由季入住 301 醫院後的特定環境造成

的。季羨林，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。對於北大、清華；對於文界；對於中國社會。假如離我們這麼近的人和事情，我們都不能對後世有一個明白的交代，世間還有清濁之別嗎？學界還有正邪之分嗎？雖然書推出了，但我的腦海裏還有不少要追究的「話題」。例如，普遍傳聞的「季羨林與北大鬧翻」，依據是什麼？我是不相信先生會對自己安身立命的北大，下什麼「狠手」的。真情有待水落石出。

回味我與季先生的多次談話，他其實是希望自己能夠效仿胡適與魯迅的。儘管在今天人們的心裏，這二位巨匠是對立著的。可在季羨林的回憶中，總是把他們並列著，說他們「對青年都是一樣的」。季追求的，正是「魯迅風骨」與「胡適情懷」的合一。

但季羨林的道路沒有圓滿。他後來在傳媒中的形象與他的「初心」大相逕庭。一個終身「從校園到校園」的學者，突然被推到「社會聖賢」的神壇上，他的資源完全是缺失的。他的資源原是用來教學和著述，後來卻被拉到了一個三教九流的大舞台上。季羨林生活與生命意義的鏈接就這樣被斷開了，鬧劇與醜劇連續不斷地在以他爲名義的舞台上演。

好在一個人要證明自己，還有寫作的出路。文字成爲他的申訴，文字中於人於社會的觀念與感受，質樸無華，與後來媒體上那些的帶有「頌聖」意味的形象，判若兩人。從《留德十年》到《牛棚》雜憶》以及他的大量散文中，先生展現一種「無華的才華」，人格的純真與善、美。那是「有體溫」的文字。這種樸拙文風，形成一道清流，可作滄浪之水，洗濯人們的頭腦。

另一位我準備去探望的袁行霈老師，「流感」住院了。曾經在中文系「百年系慶」大會上，袁老師登台一呼，提出：「一切爲了人的尊嚴」。凡是熟知他的人生遭遇與執教的學生，都會明白這對於中文系和袁先生而言，都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概括。在袁行霈老師八旬華誕的紀念文集中收了我的回憶他執教的文字，就用了這個標題「爲了人的尊嚴」。



天街小雨潤如酥

人淡如菊任繼愈

春節前，看到微信裏有：「北師大學報紀念劉盼遂先生」的消息。這是任繼愈先生曾對我着重提及的人物。我還記得，先生說話時的情態。幾句話之後，他沉默良久。劉盼遂在日本佔領北平後，堅不應聘，靠賣字畫維計生活，是一個有骨氣的人。到「文革」，劉先生受到令人髮指的殘害，所收藏的宋版《十三經》也遭搶劫。對於劉盼遂這樣具有強烈尊嚴的學者，「自盡」正是一個「完節的標誌」。

在京時，深圳出版人胡洪俠催我：「你快寫吧，任繼愈先生已經被人忘記了。」任先生從來無意成爲呼噓社會的人物。人淡如菊，正是他的寫照。任繼愈，正是他的寫照。任繼愈對我說：「寫我家老爺子，儘管你文筆極好，思想深刻，估計也不會太吸引讀者。和季先生比，他太簡單了，沒故事。」

他只說對一半。我們這個社會是「有病」的，一些樂於「逐臭」的趣聞風行於世。從這個角度看，任先生沒有「吸眼球」之事。可以說，他從不在世俗舞台上浪費與虛擲他的光陰。但任先生的故事，卻是代表中國近代史主流文化取向的「大故事」。

季羨林與任繼愈，兩位先生都與我有著深交厚恩。想起季先生，令人憤世嫉俗，拍案而起。而想到任先生，則如入芝蘭之室，良思如泉。王羲之曾書聯曰：「述古喻今，文妄作，觀天察地，人不虛生。」任繼愈正是那類「妄作」、「不虛生」的學界師表。他佔有一個精神與學問的高地，兢兢業業，立身清正。任繼愈所代表的，是那樣一批在文化主流中埋首獻身，「白首窮經」的重量級的學者，一批具有中華文化「脊樑品質」的人物。

任繼愈終身研究中國哲學，尤以老子爲專注。他一生閱歷豐富，襟懷博遠，其格局、視野，在當今學界尤爲稀貴。我受教於先生近十年，被先生稱爲「入室弟子」。此情此景，恍若昨日。先生的治學與爲人之道，已經成爲我的指引。對人生與治學的很多關鍵的原則，先生是明確地規定著我的。先生贈予我的那兩枚「西南聯大」校徽，時常想拿出來看，又不忍見之。這兩枚校徽，曾經繫在意氣風發的青年任繼愈的衣襟上。戴著這校徽的時候，是以昆明爲家園的時候。與馮鍾芸先生結爲連理，也是在昆明。

十年前，在「紀念西南聯大建校七十周年」的大會上，有人交給我一隻信封，上寫的是「張曼菱友—任繼愈 2007.11.27」。打開是一小札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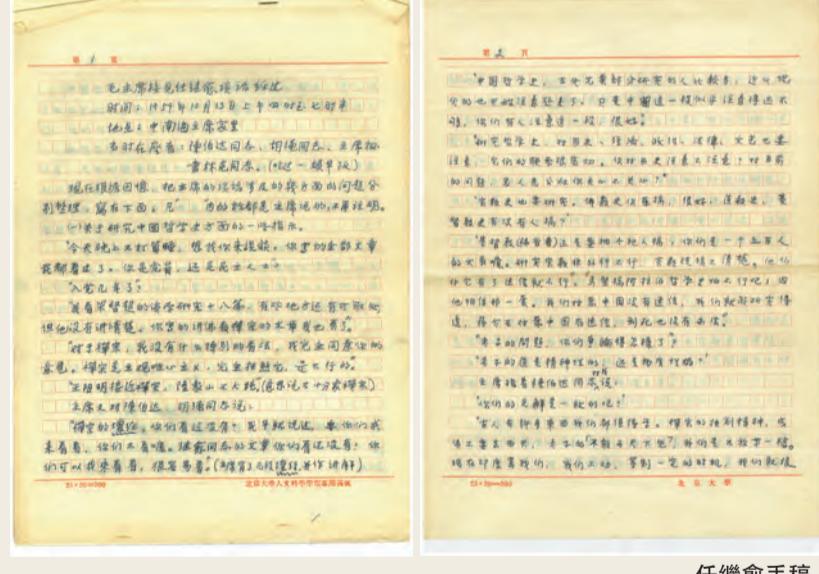
「西南聯大七十年世稱辦學的奇跡。這奇跡無非是「五四」科學與民主精神的繼續。這種精神是永遠前進的方向。」

任繼愈二〇〇七年」

前不久，任遠、任重以子女身份在《南方人物》



採訪任繼愈



任繼愈手稿

上披露了先生的當年筆錄：「毛主席接見任繼愈談話經過」。看到先生的遺筆，墨淡紙輕，而骨子裏的清香卻悠悠透出。

想起那位海外學人余英時，當面與任先生相交爲友，在先生逝世後卻大肆攻擊。對於這段中南海的往事，余曾捕風捉影說任先生：「很早就變成毛很喜歡的一個私人顧問，常常讓他去講佛教。」從這含酸的譏諷中，可見余對於「領袖接見」，其實看得更重。而在任繼愈看來，這不過是「工作」，多少年來他不願意向同仁及學生提及此事。

先生在注明裏寫道：「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覺得沒有必要寫在這裏，未記錄在其中。」這簡單的一句話，省略掉了當年毛澤東對他的好評。比起那些「見帽子就戴上」的世俗之徒，這是何等純淨的心靈境界。

還有一句話，也很震撼人。任繼愈對毛主席說：「信宗教的人是不能研究宗教的」。毛在這次談話中批准成立了宗教研究所。當時任繼愈 43 歲，一位中年的哲學教師，其人生與治學境界已讓人難望其項背了。先生走了，還在給這個世界注入清新雋永的啓示。這就是魂魄不滅吧。

春風又綠滇池岸。走近水邊，海鷗在空中鳴叫著。我不由掏出手機來，又回到那過去的日子。打開「通話」，朝著這些快樂的精靈，我曾經這樣喊過：「先生，你聽見了嗎？這是滇池上的海鷗。」那邊先生會興奮地應答道：「聽見了！我聽見了。」

